

马克思哲学论坛丛书

Marx
Philosophy
Forum

第十一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共产党 90 年

主 编 ◎ 孙 麾 何怀远

马克思哲学论坛丛书

Marx
Philosophy
Forum

第十一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 中国共产党 90 年

主 编 ○ 孙 麾 何怀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共产党 90 年 / 孙麾, 何怀远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9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坛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6861 - 5

I. ①马… II. ①孙…②何…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中国—文集②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①B27-53②D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54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马 明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字 数 466 千字
定 价 9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王 东(3)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 基本经验	何怀远(36)
李达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汪信砚(60)
毛泽东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许全兴(84)
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和对立统一规律思想的再思考	李德顺(95)
论《实践论》、《矛盾论》的民族视野	陈世珍(104)
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状及启示	林艳梅(117)
“经典表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拓展 ——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第3、5分册的微观解读 ...	徐 军(132)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及其中国化、大众化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念及其建构	何 萍(149)
马克思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及其当代价值	姜迎春(160)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理论自觉	袁祖社(170)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项思想史议题	张立波(180)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及其启示	张奎良(192)
马克思历史观:人类解放的政治哲学基础	李 兵(205)
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	唐正东(215)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前提性问题思考	吕世荣(228)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	李昆明(240)
实事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问题	张定鑫(251)

中国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

文化自觉、自信、自强何以可能	王南湜(265)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新思想的实质	姚顺良(28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与发展趋向	韩庆祥(296)
东方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的实践经验与教训	张曙光(331)
中国道路及其价值意蕴	欧阳康(354)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	夏兴有(365)
描述历史规律还是批判资本主义	王晓升(374)
“中国奇迹”背后的辩证精神	郭忠义(393)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与中国道路的探索	彭国兴(409)
重新发现马克思: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维度	王凤才(417)
第十一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学术总结	孙 麾(432)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王 东^{*}

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在迎接党的创立 90 年之际，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我们，尤其是北大人、北大学者、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者，作出深入研究、认真回答的重大问题。

同时，以下四种情况要求我们更应重视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问题。一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篇名著中，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① 为我们分析这个问题指出了方向，提供了一把钥匙，具体解答这个问题还有待我们作出细致努力。二是现有的党史著作，包括一些影响较大的重要著作，多半只是在谈到个别人物、个别事件、个别问题时，零散地论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北京大学的关 系，大都没有专门回答过这个问题，有的还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淡化这个问题。三是萧超然、沙建孙、梁柱等北大学者，也包括笔者在内，曾先后在不同程度上研究或论及了这个问题，然而或因理论概括不够，未能产生应有的重大影响。四是国际思想界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提出的两个挑战性问题。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舶来品，先是移植日本的一些思想和语言，后是照搬共产国际、实乃苏联模式的一些僵化教条，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另一种看法，如柯拉科夫斯基的三卷本《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毛泽

^{*}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00 页。

东思想，本质上是“农民的社会主义”、“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却背离了人类近代工业化文明大道，最终必然走向崩溃，这是一种在劫难逃的历史命运。近几年来，尤其是 2007 年十七大前后，谢韬等人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文章，其实不过是对这种国际思潮的回应而已。

正是上述几点汇总到一起，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在笔者看来，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言简意赅地概括为“一个主要发源地，五个方面的准备”：“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是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主要发源地，从“思想基础——理论基础——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人才干部基础”这五个方面，为建党作了重要准备；这种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独树一帜的特殊关系，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传统最深厚的现代创新型大学，更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历史文化底蕴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创新型政党；也就是说，使中国共产党与北京大学双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东方奇葩，至今仍是 21 世纪中国创新的重要源头活水。

一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思想基础——辛亥革命后 1915 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倡导民主科学，1917 年蔡元培倡导北大教育创新

中国共产党虽说是 1921 年 7 月在上海秘密创立的，然而其创立却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思想基础、社会共识。

1911 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历时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为后来的思想解放、党的创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社会前提。辛亥革命后，陈独秀从 1915 年开始创立《新青年》、倡导民主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1917 年蔡元培到北大倡导的大学教育创新，为中国共产党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并未真正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由于辛亥革命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两千多年的皇权体系、封建专制，也就冲破了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的罗网，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以排山倒海之势，昭示着中国思想解放的春天必然到来！

也正是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风雷呼唤下，1915 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树起德先生与赛先生、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反

对封建专制、封建礼教。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旗帜鲜明地阐明了自己创办《新青年》、倡导思想解放的主旨：“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从1917年起，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力倡大学教育创新，也为解放思想作了重要铺垫。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伊始，立即聘任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并支持他“把杂志带到（北大）学校里来办好了”。从此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与蔡元培倡导的北大教育革新运动，就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五四”爱国救亡运动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人才基础。

蔡元培身为翰林学士，深谙北京大学学术传统的功过得失，不惑之年又留学德、法等西方国家，特别注重吸收19世纪世界教育思想的潮头——德国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首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把注重价值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立足科学的西方近代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综合创新为一种东西合璧的新型科学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努力倡导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新教育观、新大学观，努力将北大创办为一所极富中国特色的现代世界新型大学。这既是蔡元培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创的北大传统，又是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趋势，更是北大跨向21世纪的科学发
展、创新发展目标。

在我们看来，蔡元培倡导的北大教育革新运动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要支柱；蔡元培、李大钊、鲁迅是“五四”时期综合创新论文化观的主要代表，这一思潮具有不同于陈独秀、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文化观的显著特征；蔡元培应当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领袖之一，他所倡导的融会中西文化的综合创新论应当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理论旗帜之一；过去常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今天或许可以更确切地

说，蔡元培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一员主将或急先锋。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五四”时期北大校方，对于李大钊等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共产党的活动，采取了包容甚至同情的态度，这是北大的一大特色，在世界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蔡元培积极支持李大钊先后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1917）、教授（1920）、校长室秘书（1922）；正是在北大校长蔡元培支持下，1921年11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启事，得以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完全公开地正式发表；1921年11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蔡元培校长办公室举行的成立大会，蔡元培亲自出席了会议；在校长蔡元培支持下，北京大学还专门把西斋宿舍中的两间宽敞房子，作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办公会址，并作为保存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进步书籍的图书资料室——“亢慕义斋”。

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李大钊等人的个人行为，而且是蔡元培校长领导的北大校方行为。这是那个时期各国大学中独一无二的。

二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理论基础——1918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创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重组，1921年公开

在这里，笔者要澄清一个基本事实：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最早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1918年冬，而不是现在流行的说法，“1920年秘密创立，1921年公开成立”。实际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五四”运动的精神砥柱与领导核心。

笔者以为，有证据表明，流行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为了证实这一新观点，兹列举出三位主要当事人高一涵、朱务善、许德珩提供的珍贵史料。

当年与李大钊相知甚深，过往最密，并协助李大钊，一起发起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教授曾回忆道：“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

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①

后来，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北大学生朱务善回忆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像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这说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最初发起时曾使用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的译名，以避免当局注意。这一回忆得到了相关回忆和文献的印证。

许德珩先生回忆说：“为了对马克思主义作精深研究，1918年冬，大钊同志在北大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②这一说法与高一涵、朱务善的回忆基本相同。

李大钊恰恰在1918年底发生两大转变，有助于证实上述说法：一是发表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文章，如《庶民的胜利》等4篇文章，标志着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二是从《新青年》杂志不谈时事政治转向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文化与政治实践的统一。这可以作为第四个证据。

另一个证据见之于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其中讲1917年冬，李大钊受聘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之后，迅速在北大学生中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他大量扩充了图书馆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和德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原著，把图书馆变成学习和研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1918年底，李大钊和高一涵、朱务善等还发起组织了“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它是秘密组织，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为了迷惑敌人，把马克思译成与“马尔萨斯”相似的“马尔格士”。这个研究会培养了一些信仰马克思主

^① 高一涵：《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341页。

^② 许德珩：《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义的青年知识分子。^①

据“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的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中，亦写道：“在关于记述‘五四’运动的书中，我看过一本日文书《昭和八年年鉴》，书中提到，‘五四’运动的指导者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客士主义研究会），该书并附有年表，我认为它的话是有根据的。参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酝酿、筹备、组织的经过历程，可以说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这种组织力量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前身，由他们从思想上，同时也从组织上领导和发动了五四运动。”^②

第七个证据，1960 年开始写作，1979 年才得以问世的第一部《李大钊传》，对此作了明确记载：“对于在日本时他已开始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大钊同志这时更深入地进行了探讨。1918 年冬，他在北大组织了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邀请了几个教授参加……”^③

日本方面的有关历史记载、历史文献，有助于证实这一点。美国哈佛大学的有关研究成果，也有助于证实这一点。

1918 年底，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次秘密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作用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北大、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从而使“五四”运动有了主导思想与骨干队伍，尽管当时还未直接和建党联系在一起。1920 年初，李大钊在秘密护送陈独秀离京赴沪过程中，两人对建党问题，有进一步的磋商与共识，于是就有了 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等 19 人，秘密创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时的目的，不仅是研究更主要的是为建党做准备。1920 年 12 月，李大钊教授又和政治系学生郭梦良、费觉天等人，公开成立了“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1921 年 11 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宣布成立，并在北大校方主办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启事》。这份《启事》，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献，反映了追根溯源的北大精神，在马克

① 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7 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10 页。

③ 《李大钊传》编写组《李大钊传》，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4、35 页。

思主义研究史上独树一帜。可惜前人多半只片段引用，现今不厌其详，原文照录如下^①：

北京大学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

马克思学说在近代学术思想界底价值，用不着这里多说了。但是我们愿意研究他的同志，现在大家都觉得有两层缺憾：（一）关于这类著作博大渊深，便是他们德意志人，对此尚且有“皓首穷经”的感想。何况我们研究的时候，更加上一重或二重文字上的障碍，不消说，单独研究是件比较不甚容易完成的事业了。（二）搜集此项书籍，也是我们研究上的重要任务。但是现在图书馆简单的设备，实不能应我们的要求。个人藏书，因经济的限制，也是一样的贫乏。那么，关于书籍一项，也是个人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根据这两个要求，所以各人都觉得应有一个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祛除事实上的困难。上年三月间便发起了这一个研究会。现在我们已有同志十九人了。筹集了一百二十元的购书费，至少要购备《马克思全集》英、德、法三种文字的各一份。各书现已陆续寄到，并且马上就要找定一个事务所，可以供藏书、阅览、开会、讨论之用。我们的意思在凭着这个单纯的组织，渐次完成我们理想中应有的希望。

现在谨致意校内外的同志们，盼望你们热心的赞助，并欢迎你们加入共同研究。今将我们暂拟的几行规约写在下面：

一、本会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

二、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入会手续，由会员介绍和自己请愿，但须经会中认可。

三、研究的方法分四项：

- 1、搜集马氏学说底德、英、法、日、中文各种图书；
- 2、讨论会；
- 3、讲演会；

^① 参见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9、60页。

4、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

四、本会设书记二人，担任购置、管理和分配书籍事务。

五、会员有分担购置书籍费的义务。

六、本会书籍，会员得自由借阅，但须限期缴还。如会外人想借阅时，须经本会特别许可，并交纳保证金。

通讯处：（一）北京大学第一院王有德君

（二）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

发起人 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

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 骏杨人杞

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

高尚德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

三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重要群众基础——1919 年， 以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主要 骨干，倡导“五四”运动、“六三”运动

“五四”运动的骨干力量是什么？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不然，至今还是一个未能很好解决的争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流行观点：

其一，是群众自发，没有组织，更没有任何组织的领导核心。

其二，是有个人作用，无组织作用，过去多强调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总司令”，近年来又常讲胡适似乎是“五四”精神首要代表。

其三，是群众组织，前有学生联合会，后有工人联合会，随聚随散，没有领导核心。

这里提出“五四”核心论新问题、新观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有四位代表，是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如果讲精神领袖还应加上鲁迅），他们代表了“五四”运动的四种骨干力量，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为精神领袖的某种领导作用。

北大四位名教授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四位代表——“五四”运动四大精神领袖。

（1）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主要代表同情马克思主义、劳动群众的左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蔡元培是倡导北大教育创新的第一人。

（2）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代表激进革命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群，陈独秀是创办《新青年》、倡导解放思想的第一人。

(3) 胡适影响下的《新潮》学生群，包括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青年学生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胡适是倡导白话文运动的第一人。

(4) 李大钊发起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骨干队伍，代表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先进知识分子群。

四种骨干力量比较研究：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领导骨干作用最为突出；李大钊不仅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而且是直接影响“五四”群众运动的第一人！

凭什么这样说？我们可以列出 10 条论据：

(1) 李大钊 1918 年底创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通常认为，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 1920 年 3 月成立，1921 年 11 月正式公开。而当年与李大钊一起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两个当事人——北大教授高一涵、学生朱务善提供的珍贵史料表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首倡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间应提前至“五四”之前半年多的 1918 年底。

(2) 李大钊与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用全新的民主科学观，从根本上推动了思想解放走上新阶段、新水平：从自由主义思想启蒙走向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启蒙，其中首要问题是彻底破除了对帝国主义的迷信幻想，即在“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道路”问题上照搬西方模式的空想。

在此之前，甚至直到 1918 年底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聚会上北大教授演说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们竭力鼓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和平十四条”，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连当时还是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陈独秀都说：“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后来历史的发展，加上李大钊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帮助人们破除迷信，去掉幻想，解放思想。

(3) 1918 年“五四”运动后，有两次重要的预演：一是 1918 年 5 月 20 日，2000 多名学生集会新华门，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二是 1918 年底的集会天安门——在这两次预演中，李大钊及其他影响较大的学生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都起了重要骨干作用。

(4) 1918 年 10 月 20 日，以北大爱国学生为骨干的学生救国会，为了加强联系，扩大宣传，创办了《国民》杂志，其中骨干分子主要是受李大钊影响较大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李大钊先生受聘为顾问，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5) “五四”运动还有一项重要准备，就是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影响下，由北大中文系学生邓中夏（时名邓康）在 1919 年 3 月，创办平民教育讲演团，开创了中国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到工厂去、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也为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作了重要铺垫。邓中夏等北大青年学生还协助李大钊组织“少年中国协会”，团结爱国青年与马克思主义进步青年。

(6) 受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较大的一批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骨干作用，如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人。1919 年 5 月 2 日最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听到巴黎和会消息的，主要是两批学生：一是许德珩等（国民）杂志社的北大学生，二是受胡适影响较大的新潮社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5 月 3 日晚上，讨论决定“五四”游行的北大学生全体会议上，经大家推选，黄日葵担任会议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五四”宣言。后来许德珩起草了文言文的“五四”宣言，罗家伦起草了白话文的“五四”宣言。

(7) 北大学生选举邓中夏、高君宇二人，担任北大学生代表，参与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8) 与其他北大著名教授相比，李大钊更直接地参与指导“五四”运动。5 月 4 日下午，他与一些学生骨干座谈，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并且他还身先士卒，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直接参与学生游行活动。他还与蔡元培校长等人一起，积极组织营救被捕学生。

(9) 1919 年 6 月 12 日前后，李大钊与陈独秀、高一涵等北大教授，还直接参与《北京市民宣言》的起草与散发工作，陈独秀在散发传单过程中被捕入狱。这一条列活动，对于从“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起了重要铺垫作用。

(10) 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不久，决定派代表南下宣传扩大影响，其中黄日葵、许德珩等人，沿津浦线一路南下，到天津、南京、上海做广泛联系，为“五四”学生运动发展到“六三”工人运动，做了直接准备工作。